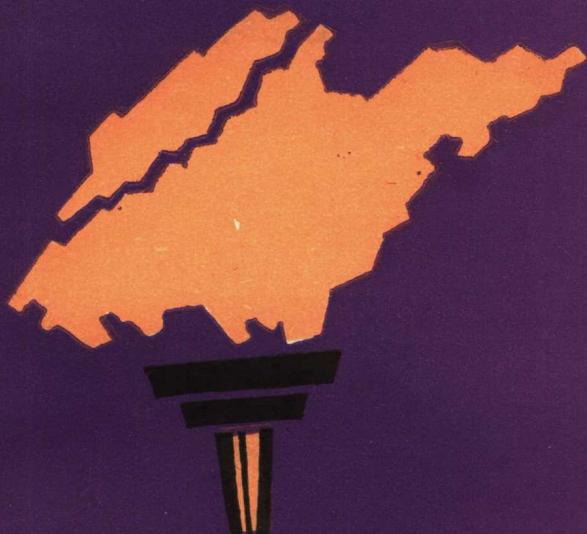


山东青运史资料

8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



山东青运史资料

第八辑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山东青运史资料

大学生访问老同志活动成果

从延安到山东敌后	鲁 钊口述	鲁国宏等整理(4)
忆当年	宋诚德口述	李 凌整理(7)
在伪满的监狱我加入共产党	温建平口述	王磊磊整理(13)
烽火少年时	牟 闵口述	徐春苓整理(20)
冲破黑暗找到党	戴昂歌口述	宋艳丽等整理(29)
夏蔚会议的筹备会	杨士敬口述	朱延庆整理(36)
马澄清同志谈高苑县青年队		李宗昆等整理(37)
用花生米洗脸	孙 倩口述	杨继鹏整理(35)
课外的一课		王磊磊(38)

《山东青运回忆录》稿件选登

成长	王一地(40)
急行军	江峻风(50)
沐河岸边	侍振玉口述 王统富 孙长桂整理(59)
敌占区的红孩子队	宋晶亭(69)

历史文献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的山东(青岛通信)	关向应(75)
悼钟效培同志	黎 玉(77)

第八辑
1986年12月出版

专题资料与研究

- 致掖县团委信 张加洛 (79)
致团省委研究室信 马少波 李立 (81)
招远县青救会 陈同山 (84)

人物简介

- 李向民 (87)
矫德凤 (88)

心香一瓣

- 遥祭 王惠芬 (89)

信息之窗

- 黄华、刘导生、王照华等同志赞成为钟效培同志建碑 (91)
“青救会”何时改为青联 (92)
枣庄市青运史工作抓得紧进展快 (93)
张黎群等同志热情关怀山东青运史工作 (95)
《山东青运回忆录》来稿踊跃 (96)

历史歌曲

- 儿童团歌 左平填词 (74)

老同志来信摘编

- 穆林 江晓天 李均 王希坚 牛玉华 蒋杰
于西之 丁宁 张伟强 远东 宋文 (98)



从延安到山东敌后

鲁 钊 口述 鲁国宏 刘 芳 整理

(摄于1950年)

按:抗日战争中期，中央青委从延安派遣钟效培等七位同志来山东。他们到达不久，山东分局扩大和加强青委，召开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创办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国青年》杂志山东版，普遍发展青年半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迅速改变了山东青运迟滞不前的消沉状态。第二年是山东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肖野、钟效培同志先后牺牲。其他五人，以后成为山东青运坚强的领导骨干。

1941年3月，我在中央党校专门培养青年工作干部的第三十八班毕业。受中央青委派遣，跟随钟效培到山东敌后工作。一起来的有三十八班同学肖野、甘霖和黄征军，还有中央青委干部刘昆、晋西北青委宣传部长苏展。

钟效培同志是江西兴国人，早在中央苏区就担任过江西团省委书记的职务。苏展同志是北京人，大学生，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刘昆同志是陕西人，肖野是湖南人，甘霖是甘肃人，黄征军是广东人，我是河南人。我们七个人来自七个省，没有一个是山东人。

1941年三八节前后，我们从延安出发，带着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一套马恩列斯著作，带了一匹马。去北方局青委的周惠等五、六位同志和我们同行。

最初的路程是在陕甘宁边区行进，不需要部队护送，走得还顺利。3月底从山西兴县的黑峪口渡过黄河，到达晋西北根据地的兴县县城，和苏展同志会合。八路军120师师部驻在兴县。我们在这里休息几天，贺龙、关向应、林枫等领导同志设宴招待我们。吃的是小米稀饭、一盆黑豆，还有两碗土豆、酸菜。这样一顿饭，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因为1940年冬天，日本军队对晋西北残酷“扫荡”，根据地缺吃少穿。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四两黑豆，部队的病号许多是冻伤。

4月初，离开兴县南行，翻过吕梁山，在军分区休息两天，准备通过同蒲铁路两侧的敌占区。这里有个清太徐游击队，便衣短枪，机智灵活，多次巧妙地在敌人鼻子底下护送干部安全地通过封锁线。这一次就由他们护送我们。

一个夜晚，我们从文水向东走了一夜。天亮时过了汾河，在晋祠东北的一个村子隐蔽休息。我们正在村里做饭，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这是我们进入敌占区第一次遇到敌人。游击队带领我们撤出村子，被敌人发现，跟在后面追击。但是摸不清我们是什么人，有多少，所以不敢冒然攻击，只是紧紧跟在后面。这一带是灌溉区，沟渠很多，游击队利用熟悉地形，领着我们在汾河东同蒲路西这一地带与敌人周旋。直到天黑，我们才在太谷县城附近越过同蒲铁路，把敌人摆脱。在这次战斗中，清太徐游击队的队长为了保护我们，献出了生命，还有几名队员负伤，他们用鲜血为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4月底，我们到达晋东南太行山深处的桐峪村，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的驻地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个星期，和周惠同志等

分手。从峻极关下了太行山。因为我们有了八路军总部给的地图和介绍信，这段路走得还算顺利。

平原地带敌人布防很严。我们在当地游击队的带领下，白天按兵不动，黑夜急速行军。5月初，在邯郸附近通过平汉铁路，在冀鲁豫边区受到杨得志、宋任穷同志热情招待。在这里，我们停了一个多月。

从冀南到鲁西，一码平川，敌人据点很多。当地的部队，因为和敌人游击作战，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所以我们往往左插右拐，走了不少弯路。7月底，我们趁黑夜从范县一气走了四、五十里，平安涉过黄河，到达山东湖西地区的鄄城县境。

当时湖西地区的情况很不好。1939年湖西“肃托”，错杀错整了许多人，群众对党失去了信任。敌人趁机进行挑拨煽动，反动会道门、红枪会也活动起来。他们见到八路军和工作干部就打，使我们很难在这里立足。我们在湖西一个多月，是很危险、很艰苦的。白天要对付敌人，晚上还要提防村里反动会道门的侵扰。当时正是雨季，由于得不到群众帮助，常常连吃住都成了问题。幸亏游击队带领，我们找到了115师教导四旅。随教四旅渡过微山湖，又连夜越过津浦铁路，到达鲁南山区。

九一八纪念日前后，我们到达滨海地区南部，临沐县的蛟龙湾村。115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都住在这里。历时五个多月，行程数千里，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115师罗荣桓政委，政治部肖华主任，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亲切地接见我们。不久，山东分局扩大和健全分局青委，钟效培同志任书记，苏展同志参加青委为委员。我留在青委机关，任秘书科长、地方工作科长。其他同志分散下去，调查了解情况。

（鲁钊同志1945年任山东省青联组织部长，离休前为陕西省教育厅长。鲁国宏、刘芳是山东大学科社系84级同学）



忆 当 年

宋
诚
德

口述

李
凌

整理

按：从1938年到1951年，宋诚德同志在山东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担任鲁中青联主任多年。他的个人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青年运动的进程。

七七事变前，我从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毕业。七七事变后参加儿童抗敌漫画团，之后又参加国民党第四十军的学兵队和红十字会的救护训练班。

1938年5月，我到临沂城南参加临郯青年救国团办的青年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马列主义，毕业后分配做宣传干事。应国民党临沂县政府的请求，临郯青救团曾派去一个工作团，大约十五、六人，协助他们发动群众，做士兵的政治工作。其中，有刘矩、王士超和我。这一年，我十六岁。

不久，我到岸堤，进了八路军的军政干部学校。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学习结业，留在干校政治处组织科当干事。

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于193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沂水县夏蔚举行。由此建立了全省青年运动的领导机构，这在我们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是最早的。当时党在山东还没有建立政权，工、农、妇等群众团体都还没有召开全省性的代表大会。我在这次会上，被选为青救总会执委，任少年儿童部长。~~会后~~随青救总会副主任陈放，在驻地夏蔚做群众工作。发展党，建立自卫团，从地主家里搞枪。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6月日军第一次大“扫荡”，这是我们党在山东敌后发展壮大的阶段。夏蔚会议后，各地普遍建立了青救会。

1939年7月成立大鲁南区党委，我在青委任少儿部长。曾随青委书记杨涤生、区党委巡视团长陈璞如，两次到三、四地委巡视工作。1940年曾参加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的孙祖战斗。这年8月，大鲁南分为鲁中、鲁南、鲁东南，我在鲁南青委，曾跟着一位领导同志到枣庄铁道游击队检查工作。

1940年7月，到临沂县青驼寺参加山东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余人。这次大会，和工、农、妇、文几个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统称“联合大会”，我被选为省青救总会执委。10月，任鲁南尼山地委青年科长，这时我十八岁。所辖曲阜、泗水、邹县、费北等地，坚持边沿斗争，打击汉奸张宪荣和顽军，斗争十分尖锐。泗水县青救会长蒋杰同志，工作很有成绩。1941年秋，我调到沐海地委。在边沿地带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成立读书会。还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组织青年参加破袭阿湖附近的陇海铁路。

1942年2月，在常山庄参加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各地到会代表五、六十人。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从延安派来的省青联主任钟效培和苏展、刘昆、鲁钊等同志。我被选为省青联第二届执委。这个时期生活很艰苦，有的同志穿不上棉衣。大会之

后，我调到泽东青干校，任一队指导员和校部组织科长。青干校学员都是县、区干部，学习期间穿军装，男同志一人一枝步枪还有手榴弹，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与此同时，钟效培同志主持创办《中国青年》山东版，由黄征军主编，我在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积极热情和急性病》。青干校结业后，任省青年工作团二分团团长，到鲁中检查、帮助工作，发展青抗先。到鲁中正赶上日本侵略军的大“扫荡”。我们就地参加反扫荡，打破了日军拉网战术。省青联主任钟效培到鲁中，我在坦埠东曾和他见了一面。不久，他在莱芜茶叶口突围负伤，不幸牺牲。

1943年初，我调到分局青委任责任秘书。当时分局实行精兵简政，青委只有我一个人，整个分局机关也不过二十来人。以后苏展同志从胶东回来，主持青委工作。3月，我负责敌区青年工作。分局青委和城工部合作成立敌占区大城市青年工作委员会，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新任书记，我任副书记。记得办过一个刊物，曾传到济南、青岛、北平和天津。这个时候，从济南、青岛甚至北平来了一些知识青年。我们成立一个敌区青年招待所，以后成立青年队，组织他们学习，队长黄征军。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彭戎、陈超和于荣光等同志。青年队前后有四个月，以后整个编入抗大一分校，队长王维尔。从济南来的有，杨琳同志的夫人王洛，她来得最早；以后有于渤、何怡、姚明、李向民等，现在都是些领导骨干。

杜前同志从鲁中调到分局，我接替他担任鲁中青联主任，时间是1943年8月，我二十二岁。从1943年冬到日本投降，这段时间鲁中地区形势逐渐稳定，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各级青救会积极参加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民主运动、参军参战和拥军优属。鲁中区劳动和学习模范高洪安、孩子诗人苗得雨，也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鲁中青联对他们作了表扬和鼓励。高晓声、叶联森两位同志

在鲁中青联机关工作时间较长，办过几种刊物。

1945年日军最后一次“扫荡”，我正在沂南帮助工作。县抗联主任李子超带着民兵小分队打游击，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我到一个小山去联系，被我们自己的人捆了起来。幸亏县委书记王介福认出了我，才松了绑。

1945年8月，到莒南大店参加山东分局群众工作会议。日本投降，9月17日临沂解放，又移到城里举行。这次会议，就青年系统来说，称为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再次被选为省青联执委。但是，这次会议我并没有参加到底，中途（8月20日前）就走了。

那时中央计划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和解放区青年代表大会。山东青年代表十四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朱永顺、张明晓、李诚、王森等。走到河南濮阳，接到电报，让我们就地待命。以后由于国共和谈，这个会没有开，11月我们回到临沂。在濮阳曾见到准备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林彪，听过他的讲话。（以后中央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他从濮阳直接去东北）我在濮阳接受任务，让我护送李澄之并押运交给中央的文件和黄金，到达山西黎城。正巧有一架飞机从延安飞到黎城，李澄之乘飞机去了延安。我就回了濮阳。在黎城飞机场，曾有幸见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

1946年1月博山解放，鲁中青联进驻博山。为了争取青年知识分子，林萍同志干了淄博中学教员，边春光同志干了青州中学教务主任，张恒轩同志和刘毅分别任博山和青州的民众教育馆馆长。鲁中青联在博山城还办了一个青潮书店（书店的名字是区党委副书记高克亭同志起的）。我们派张健和杨守先同志到烟台和大连去采购图书，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鲁迅、巴金和郭沫若的著作，以及《文萃》杂

志，等等。还买了两部电影放映机、日晒机、钢琴以及四箱手枪子弹。通过中店，我们在青年中搞了读书活动。还在博山开过一次运动会，发的纪念章。在争取城市知识青年的工作上，鲁中的摊子铺得较大，时间持续到1946年7月我们撤退。离开博山时，有二百名中学生



自左至右 前排：宫达非、宋诚德、林萍，后排：叶联森、高晓声、吕戈龙
1946年春摄于博山

跟我们进了根据地，因此成立了鲁中联合中学。印刷机让林乎加同志要走了，电影放映机交给军区成立了电影队。一个和平的梦想醒了，搞合法斗争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1946年11月，华东局青委召开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委的青委负责干部会议。由桂前同志传达到延安汇报工作的情形，讨论恢复建立青年团的设点试验工作。记得会后到临沂城里吃了一顿临沂传统名吃“糁”（音莎）。散会回鲁中的途中，看望了从华中北撤来的新安旅行团。这是一帮天真活泼又多才多艺的孩子，由左林同志带领。

1947年1月，我随华东野战军八纵上了前线，参加鲁南战役。经过十八天战斗，我军在峰县、枣庄地区歼灭蒋军五万多人。当时大雪纷飞，坦克、榴弹炮、山炮，还有装满了人和弹药的十轮卡车，在泥土掺和着雪水的路上通过。民工支前工作做得很好，沿途设站供应部队食宿，群众的拥军热情非常高涨。正象陈毅同志所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山东人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3月，

我担任鲁中区支前司令部民站部副部长，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接到电报，让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地点在河北平山。6月成行，坐上了美制十轮大卡车。山东代表团中，青年工作干部不少。胶东的鲁纪华，滨海的张明晓，渤海的朱永顺，鲁南的刘鹏。（当时是党的县委副书记，此次会后做青年工作）。土地会议结束，中央青委召开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汇报讨论各地试验建团的情况，部署由点到面的试建团工作。

1948年我在沂源，参加生产救灾。敌人的重点进攻，造成极大破坏，群众生活很苦。7月，又参加支前。济南战役结束后，成立鲁中南区党委。青委书记由穆林同志兼任，我是青委委员，做实际工作。青委的主要干部还有：李子超、王传斌、徐芊等。

1949年4月，到北平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这时他已身患重病，报告的大部分由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同志代念。当时山东青年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导生，他带领我们参加这次团代大会。山东代表团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李子超、张明晓、王森、田心、鲁钊等。

1949年7月，我到济南铁路管理局任团委书记。1951年春调离山东，到东北中长铁路工作。

（宋诚德同志离休前为大连铁道学院副院长，李凌是山东大学科社系85级同学）

在伪满的监狱 我加入共产党

温建平 口述 王磊磊 整理



1934年7月，刚刚结束在青州一个月的军训。暑假，我回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家里看看。在轮船上，因为给同学捎的家信上有“军训完毕”几个字，被日军和伪满洲国的警察抓了起来，送进了监狱。

我的故乡是山东，可我出生在鸭绿江畔的安东。上小学时，老师领我们过“五九”国耻纪念日（注一），上街示威游行。还到县东二十多里的九连城去远足，凭吊甲午战争时日军由此登上中国神圣领土的国耻遗址。儿时的我，便朦胧地想过，要洗雪国耻，再造中华。随着年龄增长，目睹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灾难，耳闻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的罪行，胸中复仇雪恨的怒火越烧越旺。

离开安东县初中，我从师于山东莱阳人士左雨农。他矍烁刚毅又善良慈祥。在左先生的教诲下，我认识了自己家庭的陈腐和保守，埋下了要挣脱这个囚人樊笼的种子，与此同时，也树立了朴素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

左先生有一个很好的青年朋友叫宋学骥，山东蓬莱人。从他那儿，我开始知道许多新鲜事情。例如，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

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开始，知道了共产主义的简单概念。通过宋先生的介绍，我又接触蒋光赤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上》等书籍。这些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由左先生代我向父亲求情，我于1933年8月到了烟台，进入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上高中。挣脱家庭封建的束缚，冲破北国恐怖的罗网，来到了故乡美丽的海滨城市，我欢欣鼓舞，深深地呼吸祖国自由清新的空气。

省立八中独踞毓璜顶高地之巅，可以鸟瞰烟台全景。校内庄严地矗立着一座高达数丈的石牌坊，这是为纪念济南“五三”惨案（注二）而建的。1933年秋招收的这批学生，有十来个是从东北流亡来的。在高四级的学生中，占了四分之一。从北满来的，有些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个别人还与共青团发生过联系，参加过反帝大同盟。从南满来的，受到抗日义勇军的影响，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是一股新鲜血液，很快和烟台的进步学生汇流在一起，一起探求真理，寻找光明。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艺的影响下，我们几个同学办起了“新文学研究会”，办了一份报纸：《鸣铎》，每周一期，出了一个学期。主人吕其恩，也是东北流亡学生。他认识水平高，思想很激进。还有一位主编陈汝翼，他来自哈尔滨，家庭富裕，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文学修养和音乐造诣很深。在《鸣铎》上，我们披露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办报的同时，我们阅读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人的著作，也看了许多外国作家如高尔基、普希金、罗曼·罗兰的作品。对于无政府主义者、颓废派、浪漫派的著作，我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

班主任解子义先生对进步学生持好感，态度很亲切。他给我

们讲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冰心的《寄小读者》、冰莹的《从军日记》，讲得更多的是左翼作家的作品，如《春蚕》、《子夜》、《华威先生》，还有苏联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唯物辩证法的几个基本特征》等等。从他那里，我初步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随着头一个学期结束，《鸣铎》被迫停刊，陈汝翼被开除学籍，然而我们的革命意志没有消沉。到1934年春，又重整旗鼓，在烟台最大的报纸《东海日报》上，办起了《原草》副刊。“原草”来自“离离原上草”的诗句，起这个刊名，示意我们象原上之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原草》创刊后，读者越来越多，稿源也越来越踊跃。延续两年，出了五十三期。要问我青年时代最激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那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办《原草》了。最近这两年，我跑遍北京、烟台、济南的图书馆，终于把当年的《原草》收集齐全，有机会我要把它印出来。

1934年5月，冯玉祥先生到烟台。曾在芝罘中学发表演讲。他说：九一八以后，我就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即便只有两粒子弹，也要和敌人拼命。一粒打死敌人，然后为国捐躯。因为有生以来，我吃的穿的都是国家、民众供给我，现在是我报答主人恩德的时候。望各位一面读书，一面莫忘救国。听了冯玉祥的演讲，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我想，就是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和高级将领中，也有象冯玉祥这样的爱国人士，中国不会亡。尤其是听到他讲：谁坚决抗日，谁就要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我愈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中国青年唯一的出路。

自从进了烟台中学高四级，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学习中逐渐形成。几位进步同学，在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中结成了革命的集

体，我们急切地寻找党的关系，热情地宣传自己的左倾观点，希望引来党对我们的注意。得空就往烟台山下正阳街的大华书局跑，因为那里出售进步书刊，希望在那里能发现知己，找到党的关系。

1934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开始对高中以上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第一年集训时间一个月。我们学校被指定到青州参加集训。我和吕其恩一起商量对策。认为抵制不参加是办不到的，只能将计就计，利用集训寻找党的关系。听说和我们一起集训的有济南高中、省立一中，还有山东大学，这些学校可能有共产党员。但是青州集训一个月，未能如愿。没有想到的是，给同学捎的家信中有“军训完毕”四字，竟使我身陷囹圄，饱尝了铁窗风味。

二

在安东日本警察署经过几次严刑逼供，我被引渡到伪满警察厅，然后又转到地方法院。1934年10月解到奉天(今沈阳)高等法院，关押在第一模范监狱看守所。日本人把接受军训和抗日反满的军事派遣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再问我受谁派遣，来搞什么活动。事实上根本没有那回事，所以我无“罪”可供，他们也一点“罪证”找不到。

在奉天第一模范监狱看守所，有一天我认识了杨于典，(又名杨坚白)。他是本溪人，二十三、四岁，共产党员，原在中共奉天特委机关负责文印工作。又认识一个东北大学学生，叫江涛，他是因为参加抗日团体“青年铁血团”被捕的。还有一个刘明山，他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几个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有着说不完的话。那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一直闪现着这一天的情景——一个共产党，一个青年铁血团，一个抗日义勇军——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烟台千方百计